

生态环境法典的原创性意义与世界贡献

秦天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以系统集成三大环境议题的立法智慧，回应了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难题；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法治表达，突破西方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困境；以“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开启了务实可行的立法路径。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表明中国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法范例。

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回顾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到一条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清晰脉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环境法学的研究与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而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是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这种自主性源于中国独特的双重社会转型与双重环境压力。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渐进发展，环境问题分阶段依次出现，其环境立法主要围绕末端治理展开。而中国同时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现代工业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型。这两个转型在时间上高度叠加、在空间上相互交织，既要应对传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也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低碳转型压力。这种双重环境压力是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决定了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种国情背景，决定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模式，必须立足本土实践。

这种自主性更体现在理论根基的原创性上。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智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条明确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定为立法目的之一，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范。

这种自主性也体现在实践来源的本土性上。河湖长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保护红线等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都被吸收到生态环境法典。这些来自中国大地的制度创新，构成了生态环境法典最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经历深刻转型。如果说过去的环境法学研究主要是在“照着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则是一场扎根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实践，体现了“接着讲”和“自己讲”的努力方向。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推动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完成从分散性立法到系统性立法的跨越。目前，中国在生态环境法治领域的整体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确立系统性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立法范式

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大领域的法律规范进行一体化整合，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在立法技术上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这三大领域恰好回应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发布的《与自然和平相处》中指出的地球面临的三大危机，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环境立法大多采取分散式、单行法等模式，这种碎片化的立法格局难以应对环境问题复杂交织的现实挑战。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的篇章结构，将这三大领域置于同一部法典之中进行统筹。这种整合超越了传统环境法以“媒介”（大气、水、土壤）划分的条块分割，确立了以“问题—目标—手段”为轴心的系统性思维。

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是这一整合模式的核心体现。西方国家的环境法典大多聚焦于末端治理，本质上是在治标。而生态环境法典将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纳入其中，是从治本的高度回应发展与保护如何统一这一世界难题。它通过建立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绿色转型等，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转化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生态环境法典还专设“应对气候变化”一章，明确了国家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机制。这种“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位一体的法典结构，为全球提

供了一种系统性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立法范式。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供了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可行路径，破解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两难悖论”。

彰显以“生态环境”命名的哲学智慧

在国际环境治理的语境中，通用的表述是“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表明立法范式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深刻蕴含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非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这种哲学智慧超越了西方传统环境法当中“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

从法律概念体系看，法典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衍生出生态环境权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核心法律概念，形成了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观、“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观的中国环境法学话语体系。这为深谙“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的西方环境法理论，提供了第三种可能的哲学路径。

提供“适度法典化”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法典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它为“领域法法典化”提供了一次有益探索，并通过“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了一种务实可行的立法路径。

“领域法法典化”，是指以特定社会问题领域为对象，将其内部相互关联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集成，形成逻辑自治、体系完整的法典。与以法律关系抽象类型为逻辑起点的传统部门法法典不同，领域法法典以社会问题领域为边界，更加注重回应特定领域的整体治理需求。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之前，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达到30余部。生态环境法典通过一体化的篇章结构，实现了从分散性立法到系统性立法的跨越。

在这一过程中，“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适度”二字——既不过度追求法典的绝对完整，也不固守单行法模式。它采取了分类处理的灵活策略。首先，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经

编订纂修，全部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编纂出台后，上述法律不再保留。其次，将现行有关流域、区域、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到生态环境法典之中，这些法律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出台后将继续保留。“法典+单行法”的双法源格局得以形成。第三，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而目前这些方面尚未制定专门法律，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就此作出一些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体现法典的时代性、前瞻性。第四，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将分散在30多部单行法中的共通性制度予以提炼和统一，极大提升了生态环境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从对世界法治文明的贡献来看，生态环境法典走出了一条“适度法典化”的道路——不追求法典的绝对完整，而是在“统”与“分”之间寻找平衡点。这种务实灵活的编纂哲学，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考虑环境立法的国家，贡献了一份中国式的法治参照。

生态环境法典的国际影响力展望

法典的通过只是“立良法”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谋善治”。生态环境法典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制度设计，更取决于其实施效果。

生态环境法典在国际层面已经展现出重要价值。绿色低碳发展编专设“国际合作”一节，规定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双边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内容。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典化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正以法治方式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并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态环境法典在施行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涉外法治命题。一是激活域外适用条款，需要妥善处理国内法域外适用与国际法规则的衔接。二是协同国际公约履约，在实施层面面临规范协同的挑战。三是衔接绿色贸易规则，需要协调好碳足迹管理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四是加强跨国执法协作，需要建立健全跨国执法协作机制。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必将推动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本身，就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与法治发展、理论创新相互促进的产物，必将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化传播。

（作者为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研究旨在阐释政治制度、研究国家治理、解读政治实践。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以中国之理、中国之道、中国之学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努力把党的创新理论有效转化为政治学学科命题、知识话语与学术理论，实现政治引领与学术创新的有机统一，为构建系统完备、逻辑自治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坚持守正创新，建基于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出一批重要概念和观点，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视域，创新了政治学学术命题，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初步构建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

学术基础不断夯实，学科体系逐步完善。中国政治学研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构建“大政治学”学科布局，学科覆盖面持续拓展、体系化程度不断提升，学科场域涵盖政府行政、公共管理、国家安全等学科专业，发展了全球治理、中国学等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积极引入历史学、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显著推动了政治学本土化、自主化进程，为学科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中国学派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学科建设的主阵地，不断优化政治学专业布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兼具政治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专业人才，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同时，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大命题开展了大量学理性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夯实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基础。

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标识性概念集群逐步形成。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学界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提炼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话语的垄断地位。目前，“民主观”“治理观”“大党之治”“中国之治”等，已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学理性的阐释力和传播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和学术积淀，彰显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发展力。

实践导向更加鲜明，服务能力逐步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需求，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中国政治学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经验与制度优势如何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基层治理创新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强、具有问题导向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充分体现了政治学服务实践、推动实践的重要功能。

国际视野持续拓展，学术交流逐步深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坚持开放包容、拓宽全球视野，积极参与政治学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努力推动中国政治学话语走向世界。更加自信地站在中国立场和世界政治历史维度，增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自觉。目前，学界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时代命题交出了中国政治学答卷。

也应看到，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不少难点堵点卡点。例如，学科体系化程度不足，自主性、系统性有待提升；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学术评价体系 and 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创新能力和学术治理体系仍有欠缺。这些问题，都要在今后学术创新和学术治理体系革新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进一步总结中国治理经验、提炼中国治理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广阔舞台，而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结中国治理经验、提炼中国治理理论，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肩负的重要使命。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系发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为方向，牢牢把握中国政治学的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更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优越性，为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政治课题提供理论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也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图景、新选择。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实践路径，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有利于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创造融通中外的政治学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政治学智慧和力量。

政治学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学问。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以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重点，深刻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与思想精髓，将其有效转化为研究命题、知识话语与学术理论。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治学学科视角发掘理论学术资源、系统阐释道理学理哲理，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政治学人坚持自立自强、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做学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基于学术研究规律创造更多融通中外的政治学新命题、新范畴、新理论，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学科建设和学术治理体系革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为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增光添彩。

（作者为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效与前瞻

张树华

以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消费升级

顾雷雷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既是破解供需结构性错配的现实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选择。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推动供需适配，促进生产供给端主动适应消费趋势变化，在质量、结构、效用等方面动态精准匹配多元消费需求，才能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而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美元，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特征日益鲜明；同时，部分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破解这一矛盾，既要靠需求侧的引导，也要从供给侧主动作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优质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围绕这一目标，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比如，去年发布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提出5个方面的举措，正是为了增强供需适配性，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在一系列措施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个百分点，持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作用。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更多新的商品将进入消费市场，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带来新的消费增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为进一步推动供需适配指明了方向。“适应不同群体”体现了施策要精准，意味着要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收入、不同年龄层差异等，避免“一刀切”；“扩大优质供给”是路径，通过提升商品与服务质量，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落实这一要求，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服务消费扩能，健全促进供需良性循环的政策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内需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提升商品供给质量。高质量的供给能够开辟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空间。比如，近年来即时零售等新业态依托数字技术重构消费方式，成为零售业增长较快的

板块之一；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一级能效家电等绿色智能商品成为消费者的普遍选择。这表明，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能够为消费扩容升级注入内生动力。在实践中，应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提升供给质量，一方面，推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与消费品工业深度融合，改造提升食品、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破解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使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优质商品供给不断丰富。

培育服务消费新优势。服务消费具有高频次、强体验、长链条的特征，已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到博物馆延长开放带来的“博物馆奇妙夜”，再到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既表明新的服务消费场景通常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增长点，也体现出优质服务供给的重要价值。提升优质服务供给，一方面，要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放宽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旅体育等领域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总量；另一方面，要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加快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护等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生活性服

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以优质供给的不断扩容支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拓展优质供给新空间。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直接丰富居民的消费选择；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能够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提质，推动国内服务供给升级。比如，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1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额达834.9亿美元，一大批全球优质消费品经由这一平台由展品变为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推广至全国，2025年入境外国人超过82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攀升，入境消费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亮点。在此背景下，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关税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深入推进，扩大开放与促进国内供给升级正在形成内外联动、竞争有序的良好互动格局。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专题深思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